

社会学家

TEAHOUSE FOR SOCIOLOGISTS

总第八辑 2004.3

茶座

- 【本辑聚焦：现代人与休闲
“共生理念”的社会学解读之一
“反抗”还是“共谋”？——“阿米巴效应”和人类变形虫
买者定价、社会嵌入及其他——台湾访学随笔之三
面对高技术的困惑：我是谁？——布查德和他的双生子研究
从“龙生龙，凤生凤”说起——日常行动背后的法律社会学基础
“断裂”：一个洞察当今社会定位的概念
- 【苏国勋
【张小军
【李培林
【肖峰
【陈心想
【滕彪
【应星



山东人民出版社



【卷首语】

缓慢之德

南朝的刘勰在论及魏晋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慨而多气也。”然而，就在这个文人士夫“雅好慷慨”的年月里，最散漫的文人恰恰也生活在这个时代。

是竹林雅集、一醉经年的阮籍吗？要不就是东山高卧、与世相忘的谢安？但我以为，这个时代的懒散人之最，当非性格刚毅沉雄的嵇康莫属。为什么？

据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他“性复疏懒，筋弩肉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这也就罢了。每逢内急，他要让尿在膀胱中转好几转，才肯慢慢起身去如厕。真正是散漫得可以！传统上往往将慷慨成仁、舍身求法视为美德，什么时候“懒散”竟也变成了德目之一呢？

有和尚向来客抱怨镇日忙于应酬官府，到处化缘，以至于忙得连经也顾不上念了。客人问：“何不出家？”

我们处在一个匆促、浮躁而忙碌的时代。这是一个连“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高僧大德也没有工夫遗世独立，整日价忙于聚敛香火钱的时代。慢的乐趣，似乎已经失传了。

说缓慢是一种德性，是因为喧嚣浮躁的社会，不能不需要超越的、静观的文化来加以平衡调节。古人说，性缓佩弦，性急佩韦。讲究的是社会人生节奏的快与慢、动与静的均衡。这，体现了一种关乎时间的智慧。

或许，知识人在当下的社会功能之一，就是将行色匆匆的现代社会的时钟，拨慢一些。作家董桥说，从周一到周五，那是政治经济争取掌声的时代；到了周末，衣上的征尘半消、酒痕已干，合当听听雨后深巷的卖花声。让典章制度给心灵上磨损出的溃疡得以平复。

善哉斯言！

王 焱

2004年11月2日

目 录

主 编 张立升
执行主编 王 焱
责任编辑 王海玲

【卷首语】

王 焱 缓慢之德/1

【本辑聚焦：现代人与休闲】

安希孟 “不闲暇，毋宁死”/4

胡伟希 论“休闲”/12

黄应全 休闲时代不是末人时代/18

王小波 正面是休闲，背面是匆忙——现代人的生活节奏/24

孙 郁 闲人闲笔/30

【学术沙龙】

苏国勋 “共生理念”的社会学解读之一/36

张小军 “反抗”还是“共谋”？——“阿米巴效应”和人类变形虫/42

李培林 买者定价、社会嵌入及其他——台湾访学随笔之三/47

【海客谈瀛】

薛 涌 我们离母系社会有多远？/53

陈心想 从“龙生龙，凤生凤”说起——布查德和他的双生子研究/59

秦明瑞 大学生大龄化：德国社会和高等教育面临的难题/66

【茶烟一缕】

许章润 罪者的清白/72

戈 革 赵飞燕玉印/74

李远山 曹操与蔡文姬/79

张立升 俯仰之间——等级、意识、感觉及其他/84

【社会经纬】

肖 峰 面对高技术的困惑：我是谁？/88

洪大用 应对高风险社会(下)/95

滕 彪 日常行动背后的法律社会学基础/102

杨继绳 我看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上篇)/107

【夜读漫记】

应 星 “断裂”：一个洞察当今社会定位的概念/116

肖 瑛 反身性：一种新的现代性诊断视角/122

于 一 社会学家中的一个异数/125

王学泰 话说江湖(下篇续完)/131

【众生世相】

赵铁林 黄明芳 再访“王老头”——老北京话城南之三/136

费多益 女性休闲：主妇+花瓶？/143

【茶座信箱】

刘军强 小童逢盛会——第36届世界社会学大会志愿服务见闻/149

【学术资讯】

◇生物技术研究走向何方？◇超级病菌◇社会安全感与风险社会◇生活有趣抑或无趣——数字中国◇亚洲光棍增多危及世界安全？◇密友资本主义◇诺夫乔伊的单元观念史学



“不闲暇，毋宁死”

安希孟*

这世界有时如此颠倒

真正的闲暇并不是无所事事，而是自由地做自己愿意做的事。如何度过闲暇，乃是本真实存的映照。社会越向前，闲暇就越多。闲暇与工作的内涵随时代而转移，随历史而演进，而互易其位。本文主张，闲暇应免去旧式文人的自命不凡即对社会的冷漠。闲暇不是中国的“无为”——旧时中国文化的闲暇是在家吸鼻烟，但闲暇也不是金殿策论、治国安邦、科举取士、沽名钓誉。

休闲、闲暇，就是“今日得宽余”。在英语中，“闲暇”叫做 leisure，指 time when one is free from work or duties of any kind。闲暇居然同自由联系在一起。“不自由，毋宁死”因而就是“不闲暇，毋宁死”。对 leisure(闲暇)的另一种解释是：use of freetime for enjoyment(自由支配的时间里的消闲)。闲暇因而是分外的事。但闲暇也不是无聊，闲暇恰恰是为了排遣无聊和困倦，闲暇时所做的是要解除无聊。

闲暇社会学，亦称闲暇时间社会学，在二次大战中形成。但最早研究闲暇的，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剩余价值论》。他说：“闲暇时间是满足绝对需要的劳动时间留下的从事其它活动的剩余时间，是劳动者用于消费和用于从事自由活动的时间。”20世纪德国天主教神学家皮柏(Josef Pieper)著有《论闲暇》。他说，哲学应当带我们到喜悦和沉静之地，而不是到绝望和困惑之地。

在世界各大民族中，欧美人善于享受闲暇。这源自古希腊奥林匹斯诸神。“最严肃的思想与制度，在希腊人手中也变成愉快的东西。”希腊人的天国是阳光普照下的永远不散的筵席。在荷马史诗中，最有福

* 作者为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教授。



的人总是享受更好的青春的人。古希腊的宗教仪式也是在酩酊大醉中进行。悲剧、喜剧、歌剧、舞剧、体育，都是使神灵娱乐的手段。他们不曾想到苦修、斋戒、祷告、忏悔。一个追求幸福的人总得设法寻求闲暇。但灾区的饥民不会去种兰花。穷人没有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闲暇的概念因而是辩证的、相对的。对某些人是闲暇，而对另一些人却是工作。下棋之于我们是闲暇，而对于棋手却是工作，很累。在有些人视为闲暇的事，另一些人则视为奢靡、颓废、堕落。对于整日用体力辛勤劳作的人来说，读书就是闲暇。农民若在田间看书，负薪挂角，就是怡情悦性的闲暇；可知识分子读书之余，反而以养花、种菜、下棋、打球为闲暇——这世界有时如此颠倒。不同的人，闲暇观念也大为不同。

追求幸福就是追求闲暇

休闲同懒散、慵懒、放荡淫逸、穷奢极欲毫无共同之处。一味工作会使人慵懒，一味闲暇也使人无聊，适当的休闲则使人精力充沛。休闲其实也得全身心投入，没有投入便没有休闲。一个追求幸福的人，总得设法寻找闲情逸致。消遣是使我们欢娱的开心果，但如果没有精神活动相伴，则是枯燥的，等于活着被埋葬。因此，闲暇不是游手好闲，不是心不在焉，不是嚼舌根，不是传小道消息，不是沽酒买醉，或做低级无聊的恶作剧。闲暇乃静观人世，冷眼向洋，乃是对宇宙的大彻大悟。闲暇是闭门杜嚣和思索的时机。闲暇乃是思考“虚无”，由“聪明”转入“糊涂”，将生活中是非、真假暂时遗忘，把矛盾、纠纷浑然忘却，进入无差别境界。闲暇是达观，大彻大悟，是世事洞明。

闲暇乃文明的结晶，犹如文明是闲暇的结晶一样。希腊人说：“悠闲出文化。”闲暇使人有了文学艺术创作。这些文学创作、艺术表演、哲学活动反过来又成了人类劳动。世界上很多有价值的精神产品都是在闲暇中完成的——从不期待黄金和报酬。今天的人写文章是为了晋升和增加收入，当然不可能留下传世之作。当初的人在闲暇中所从事的，有时仅仅是为了纯粹的快乐，但他们用闲暇时间进行研究的创造却给我们带来福分。从比萨斜塔上做自由落体实验的人和发明灯泡的人，



首先利用的是闲暇。闲暇可以被看做是自由的活动。因而,闲暇不是索取,而是释放;是放弃,而不是抓紧。

闲暇因而可以抹去罪恶。双休日和节假日是将工作日的罪恶抹去的海绵。人类的许多罪恶念头和过大的权力是在工作日形成的。浩劫的发动、战争和政治运动的策划就都是在紧张的工作和会议中进行的。勤于工作的人应当让自己有闲暇的时间去省思,以便减少犯罪的念头。贪渎的人甚至节假日也马不停蹄,其实他们应当借此反省。有的地方制定节假日廉政法规。然而贪渎的根源在权力,在工作日,在职场。因此,应当制定的不是节假日廉政措施,而是约束权力的规则。

有一位文艺作品中虚构的人物说:“八小时以外是我的自由。”就是说,八小时以内不是他的自由。然而就连这也曾遭到批判。但其实,八小时以内同样也应当是他的自由。不过,比起下班后的闲暇,工作其实不是自由。工作之余的闲暇乃是一种真正的自由。然而,工作、学习与休闲,都应当被理解为人的基本权利才有意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闲暇无非是让人从工作所造成的远离人自性的恶果中恢复元气。休闲为的是让工人增加利润。然而,闲暇固有的价值应当在于使人充分实现人性的尊严,使之超脱纯粹的物质生活。到了共产主义,人们上午打鱼,下午当哲学家。工作着也是快乐的,工作也是享受。昔日,体力劳动是工作,脑力劳动是闲暇。然而按马克思的意见,未来的人的全面发展将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于一身,集工作与闲暇于一身。争取8小时工作制,曾经是欧洲工人游行示威、罢工抗议的结果。看来,闲暇乃是斗争的产物。闲暇权如今是人权的一部分。

一个人的存在和本质是由他如何打发闲暇来决定的,而不是由他在大礼堂的报告或工作时日的“勤勉”来决定的。大多数贪渎之徒是在闲暇时收受贿赂和腐败的,而不是在主席台上腐败的。他在主席台上正襟危坐,高调入云,口念正经,是一个仁人君子。他在工作时间很可能是勤勉的实干家。这里犯罪的根源仍在于争取官位和工作权力中的制度腐败。错误不在于休闲,而在于工作日。管好双休日,其实首先应管好工作日——制约权力。他能在闲暇日腐败,是因为工作日大权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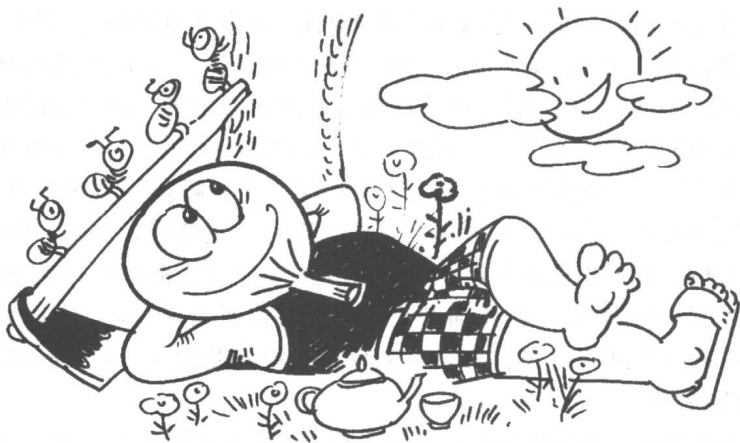


握。但闲暇如果安排得不得体，便会成为邪恶与犯罪的渊藪。公费旅游、公款嫖娼，就是例子。所以，对闲暇也要有法律约束。一方面我们承认人的自由权，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同时限制官员的权力。

让灵魂沉静，使身体放松

真正的思想家向往的是摆脱事务主义的闲暇。真正的哲人在闲暇中领悟真谛，而不是相反。不会思想的人往往很忙碌，他不能偷闲思考问题。他读书但不思考，他疾走而不散步。平庸的学者逃避思索，也逃避闲暇，他使自己很累。只有在悠闲雅静的环境中人才能思索实存。

没有闲暇，人就不可能有思想和艺术活动。文化就是从闲暇中产生的。许多人忙碌终日，没有闲暇与思索，结果一无所获。休闲就是让灵魂沉静，使身体放松。如果我们注意那些才思敏捷、富于创造精神的人，就会发现他们懂得娱乐和消遣。闲暇使人愉悦、沉思、耐心、宽容，具有博大胸怀。一种幸福的生活必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恬静的田园诗般的生活。现代城市生活喧嚣，使人感到乏味、急躁、苦闷，生活成了沙漠中苦行僧的朝圣之旅。过分的紧张使人丧失自信。人际关系的紧张可能就是由于缺少闲暇。



〔金马〕



休闲要服从法制。休闲不是私人事务。大城市三令五申不许“养犬”，禁放鞭炮，但人们置若罔闻，我行我素。外国人遛狗用塑料袋装狗的排泄物，中国的“爱犬”随处排便。中国人在休闲中也不忘记使法律成为虚文。大街上驾车逆行、闯红灯、跨越隔离栏、昂然骑车出入大门，已司空见惯。中国的步行街往往马达轰鸣，车如流水。我似乎以为闲暇时的藐视法规，乃起因于工作日中国人之不守法，乃起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与他人打交道时不知守法、守信为何物。

闲暇不可过度，人也不可沉湎于闲暇。要是一年四季全是游戏，那游戏也会像工作一样令人疲倦。专业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其实品尝不到旅游的乐趣，他视导游为谋生手段。游戏、养花、养宠物、旅行等之所以珍贵，乃因为它们是偶然的事，惟此才能引起人们的乐趣。养花种菜如果成了劳累的工作，就丧失了休闲意义。

是真学者自闲暇

有一篇很关心世界命运与前途的文章提出，人的一生抛开吃饭、睡眠、排泄、散步、待友、开会、听音乐、看电视、赏花玩景等，可用来工作的时间大约只有十年，因而生命很短促。作者因此主张，应当抓紧时间工作学习，“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革命不要命，要命便是反革命”。这精神委实可敬。我们有过白天黑夜连轴转、加班加点的传统，但今天的人们会拒绝加班加点，节假日工作，工资还得翻番。其实，消闲与休息，依然是我们存在的一部分，并不就在存在的时间之外。因而，休闲是存在与生命的题中应有之义。说抛开休闲，你的生命（指工作与阅读）其实只有十年，这种说法不正确。“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真理就存在于日常生活起居饮食中。闲暇是存在的一部分。生命包含休闲。休闲与生命有份。我们怎能将休闲当作无意义的东西从生命中开除出去呢？离开休闲中所做的一切，生命乃是空虚。对普通民众而言，现代社会过于繁忙的工作频率，造就的是人的异化和单向度的人。人只有在闲暇中才能实现自我。

不会欣赏，就没有悠闲。整日工作，会使人无聊而且乏味，工作反



成了累赘。但也不是人人能从旅游中与自然冥合神契。休闲若缺乏鉴赏的态度,那无聊就会和工作的乏味一样有害。司汤达说:“无聊会夺走一切,甚至连自杀的勇气也夺走。”冗长的工作和冗长的休闲一样,会使人感到无聊。人在闲暇中总要做什么,而不是无所事事。消极的闲暇是免除工作的劳累,即不做什么(from);积极的闲暇是有所为,即做什么(for)。否则,闲暇就会成为我们的负担。

我们时代的闲暇越来越正规化、法制化了。双休日和放长假,乃是我们时代的恩赐。然而在休闲时,人们往往暴露出被工作日遮掩的面目和本能。一个人在机关是衣冠楚楚的官吏,在家庭或外出的私人生活中却可能会鲁莽造次,面目全非。个人在远离工作时的闲暇生活不再是小事一桩,尽管不能说是“反修防修”的大事,但的确关系到天下苍生。休闲之符合法制,也是时代的进步。

据研究介绍,诺贝尔奖获得者、世界顶尖级的科学家的发明创造,常常是在咖啡店、沙龙聚会时闲聊中得到启发的。这当然不是说闲暇应当很严肃、很学术,而是说,学术研究这等大事,也可以从闲暇与轻松的自由开始。弥尔(J.S.Mill)的职业是东印度公司的职员,业余爱好却是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斯宾塞(H. Spencer)的职业是测量工程师,业余却是思想家。丘吉尔的业余兴趣是文学、历史、油画。不把学问当负担,这很有启发性。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是真学者自闲暇。

闲暇的社会意义

中国文人的消闲有些酸气。吴祖缙在《烟》中说:“吸水烟,显然的,是一种闲逸生活,消遣与享受,终日辛苦劳动的人忙里偷闲。”阿美在《吃茶文学论》中说“吃茶是一件雅事”,属于名士之流。梁实秋认为,下棋是为了消遣,是一种斗智不斗力的游戏,是过剩精力的发泄。提笼架鸟曾被斥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们今天已视为当然。然而我认为,这些并不是消遣和闲暇活动的惟一或主要内容,它们是生活的点缀——仅仅是点缀。闲暇不应当成为名士的此等洒脱。传统中国社会缺少



闲暇,是因为政治太过大一统,人们只能隐遁、逃避政治。

我们固然应当学会休闲,利用闲暇,因为缺少闲暇,犹如数学上缺少“零”,音乐中缺少休止符,绘画中缺乏留白一样。没有闲暇,就好比文章中没有标点符号,好比电视剧没有分集。人类如果永远是工作的奴隶,就会被束缚在狭隘的天地里而脱身不得。不过,上述消闲活动,仅仅是生活的烘托和陪衬。为了使音调更铿锵,使山水更壮丽,使实数更大,休闲活动应当为工作或更高级的闲暇——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服务。闲暇因而应当把思维的快乐和写作、欣赏与阅读包容在内。如果离开了创造性、益智性活动,这类消闲便流于庸俗。“昼闲人寂,听数声鸟语悠扬,不觉耳根尽澈;夜静无事,看一片云光舒卷,顿令眼界俱空。”中国文人的消闲缺乏社会关切。今天的闲暇应当具有更宽广的人文意义和社会意义。昔日的闲暇呼酒买醉,酣卧床榻;今日的闲暇却可以去指点江山,品评人物。旧时的闲暇更具私人隐秘性,可以不顾及社会影响;今日的闲暇更具有社会大众的文化意义。在这一方面我隐然感到,西方哲人眼中的闲暇似乎与中国古代文人有所不同。西人更重视闲暇的社会关怀意义而不仅仅是个人洒脱与离尘绝俗。霍布斯云:“闲暇是哲学之母。”富兰克林说:“闲暇就是为了做一些有益事情的时间。”这里,社会人文关怀居首位。我不认为闲暇与豁达就是对社会人生取冷漠的态度,毫无热情。真正的闲暇因而应当有一份社会责任。

真正的休闲并不是无所事事

西方休闲的概念来自圣经,因而休息权同工作权、劳动权一样是神圣的。“劳工神圣”,劳动者需要休息才能工作。因而,我们也可以说“闲暇神圣”。上帝创世用了六天时间,第七天休息。八小时工作日,一周一日休息(或双休日),来自西方而不是中国。按圣经,不仅人和上帝休息,土地也休息。西方的轮耕制、休耕制是比较人道的农作制,它来自圣经。圣经第七天乃是为了崇拜上帝。人如果一味工作,就会忘记神灵,肆无忌惮。教堂的崇拜使人脱离工作日的邪祟。休闲乃是要人饮水思源,返本归根。在《旧约圣经》中,休闲的含义是“安息”,还包括和平



息战与脱离苦难的意思：“他（所罗门，意即‘太平’）在位的日子，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

上帝创造宇宙后，地球自转和公转，有白天黑夜，有春夏秋冬，才有万物生长和人类休养生息。没有闲暇，也许就没有人类的传宗接代。圣经把休息叫做安息，其所指包括：没有战争，脱离苦境，远离人群，静谧思索。劳碌、沮丧、生活的风暴、忧虑、烦恼、疲惫、劳苦，都会折磨人。安息、休息因而就是回到神的怀抱，与神同在，仰赖和依靠神。这是休闲的宗教含义。古今中外，大部分节日与宗教有关。中国传统农事节日也同祭祀活动联系在一起。人利用闲暇沉思上帝。然而今天的人则利用闲暇沉思人道，各种节日也与人事有关。若没有形形色色的节日，则人性会败坏，妇女、儿童、残疾者、艾滋病患者将得不到尊重。闲暇的人文意义已超过了宗教意义。

罗素说：“一个明哲追求幸福的人，除了他借以建立生命的主要兴趣之外，总得设法培养一些闲情逸兴。”在各种美好生活中，不同的生活应当保持均衡，绝不可以把其中的一种推至极端，使其余活动成为不可能。休闲、闲暇和闲谈属于日常生活，同读书、学习、考取功名一样，也是真实的生活。对饕餮者而言，一切乐趣都是为了口腹之欲。今天的人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然而，快乐的总量却减少了。

生活中那些精力过人的人，文思泉涌的人，往往懂得一张一弛的道理。他知道忙里偷闲的乐趣。旅游和娱乐往往是生命之路。萧伯纳认为：“真正的休闲并不是无所事事，而是能够自由地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闲暇就是做你喜欢做的事情。真正的大彻大悟者，从心所欲不逾矩。现代社会的人在滚滚红尘的官场和商海中身不由己，整日打官腔，不得不交际应酬，但这并非他的真正喜欢。闲暇就是回归真正的自我。

英国诗人渥兹华斯说：“自然的珍宝你探不到底，它既能怡情，又能益智……来自春天树林的一种天机会教给你认识许多东西。”到大自然中去，与漫漫云霓为伍，听虎啸猿啼，驾一叶扁舟，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就算领会了闲暇的极致。休闲因而不是无聊，不是无所事事。休闲能使人回归大自然，领悟大自然的真谛与奥妙。



· 现代人与休闲 ·

论『休闲』

胡伟希

一、休闲与生命的中道原理

人类对休闲的体验与人类对生命的自我反思同样古老。当亚里士多德将休闲定义为一种“不需要考虑生存问题的心无羁绊”的生存状态时，他实际上是说，幸福就是休闲；人只有在休闲状态下，才回复到生命的本来状态。因此，休闲是生命的本真。

但不要以为，这种生命的真实状态，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娱乐或者“空闲”。亚里士多德明确说，嬉戏娱乐并不是真正的愉快或幸福的源泉，它们与休闲毫不相干。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幸福的休闲是过一种符合“中道”

的生活：凡事要懂得节制，任何事情都应当有适当的比例，以与自然的公正观念保持一致。

为什么生活须以“中道”或“中庸”为最高的原理呢？这是因为，生命与任何大自然的现象一样，有其节律或动律；这种生命的动律，乃一弛一张也。因此，不仅做事要有节制，不要“过头”，而且，人只有处于这种动静适度保持平衡的状态，才无害于身心，才会永远幸福。于是，亚里士多德称中道为生命的第一原理，认为它是人生的最大美德。

二、休闲与生命的自愿原则

休闲的本质乃是自由。因为人只有处于心无羁绊的状态下，才是自由的。但是，自由有不同的含义，而且彼此之间难免发生冲突，而休闲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尝试着摆脱现实生活中这种种自由之间的冲突，从而追求一种不再分离而完整的自由。

这种完整的自由，有赖于自愿原则在生命中的贯彻。所以，亚里士多德的休闲同样非常注意在自愿与非自愿的行为之间做出区别。他说，人们必须谨慎地去选择美德，如果一种好的行为是你被迫做出的，那么，这只是一种不得已的行为，不能被称为美德。这与孟子所说的，

* 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真正的道德行为只能是“仁义行”，而非“行仁义”，其思想取向是一致的。总之，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自由选择”至关重要，它使美德成为可能，也使幸福成为可能。

生命的自愿原则的贯彻，可以使我们明白何种行为是休闲，何种行为不属于休闲。当篮球运动属于我们自己喜爱的活动，并且我们自愿去玩时，它是休闲；但是，当篮球运动属于一种职业性的运动，并且为了夺取冠军而去竞赛时，它不是休闲。同样，选择一种职业出于我们本然的爱好，当我们从事这种职业工作时，它可以是休闲；反过来，当一种职业仅仅是谋生的手段时，它不可能是休闲。

三、休闲与自我实现

迄今为止，人们常常从工作而非休闲的角度来对人加以定义，认为人是为工作而生、为工作而活的。所谓“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就是这一思路的经典表达形式。其实，我们进一步深思就知道，当人的基本的温饱问题解决以后，慢慢地会有其他各种的欲求。比如马斯洛提出：人有五种基本需求，从最初的生存需求，最后会达到“自我实现的需求”。这里马斯洛将自我实现作为人的最高层次的需求，尽管这样，它还是人的一种基本需求或基本需要。这说明，自我实现才是人的根本需要；只不过，这种根本需要的实现，必得以其他各种基本需要的满足作为前提。所以，无论从事工作也好，生活中种种其他需要的满足达到与否，都从属于自我实现的需要。而真正的自我实现之境，就是休闲。它是生命的一种深度关怀与觉醒。人处于自我实现之境，会达到生命的一种“高峰体验”，人甚至会感到他与天地合为一体。这就是中国古语中所讲的“知天”与“同天”。

因此说，人的自我实现，或者说休闲之境，才是人追求的目标。说人有自我实现的潜能，也即是说人有追求休闲的潜能。当然，人的这种休闲潜能的发挥与否，需要种种外界物质条件以及文化条件的满足。但无论如何，人是会达到休闲，或者说是为了追求休闲，才去试图创造种种物质条件以及文化条件的。从这种意义上说，人类的工作，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无论是物质生产，还是文化生产，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人类的休闲。



四、休闲与游戏精神

真正的休闲生活方式，将打破工作与业余之分。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摆脱必然性是终身的事情，它不是远离工作或任何必需性事务的短暂间歇。因此，真正的休闲不是在工作之外时间的放松与娱乐，它其实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与工作态度，亦即“游戏精神”。

席勒说：“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这话可谓得生命价值之真义。问题是，工作作为“游戏”如何可能？“游戏”绝不意味着对工作的不负责任与马马虎虎，相反，它需要的是身心的全副投入。作为游戏的工作，其态度是“忘我的”，一如我们在儿童时代宁可不吃东西，也要玩游戏。当然，这种游戏态度的前提是：工作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我们是在从事一项真正符合个人天性与志趣的工作。

即使工作不是我们自己所选择的，从游戏精神出发，我们才可以将工作审美化与诗意化。工作的审美化与诗意化，其实就是生活的审美化与诗意化。日常生活中，时时存在着矛盾与冲突，甚至给我们带来苦恼与不快。但是，从总体上说，每个人都不愿放弃生活。这不是说我们对生活另有企求，而是说，这日常生活本身就可以是美的。游戏心态其实就是一种审美的心态：它让我们在平凡中看不平凡，在日常生活中体会那人生的种种奇迹与不平常。

五、休闲与审美

一旦对于生活保持一种游戏精神或游戏心态，我们就会发现，生活其实是美的。所谓生活是美，不意味着生活中没有矛盾与冲突，也不意味着生活可以远离不幸与痛苦，而是说，我们能化解生活中种种的苦难与不幸。因此，康德将美划分为“崇高美”与“优美”，是有充分道理的。他说：“那些大腹便便的人们，他们精神上的最丰富的作家就是自己的厨师，而其所嗜好的作品则只见之于自己的窖藏。”这说明，常人的许多痛苦与快乐之感，都与个人自己的感官满足程度或者个人利益相关联。而休闲之所以是一种审美，就在于要求我们超越这种个人的小我与感觉之快乐。因此，哪怕是个人遭遇的极大不幸，它也可以成为一种个人的审美经验。这不是说我们喜欢或者甘愿遭受这种不幸，而是说，



一旦遇到这种不幸，我们可以以审美的态度去观照它。所以，康德才说，崇高与优美“这两种情操都是令人愉悦的，但却是以非常之不同的方式。一座顶峰积雪高耸入云的崇山景象，对于一场狂风暴雨的描写或者是弥尔敦对地狱国土的叙述，都激发人们的欢愉，但又充满着畏惧；相反的，一片鲜花怒放的原野景色，一座溪水蜿蜒、布满着牧群的山谷，对伊里修姆的描写或者是荷马对维纳斯的腰束的描绘，也给人一种愉悦的感受，但那却是欢乐的和微笑的。为了使前者对我们能产生一种应有的强烈力量，我们就必须有一种崇高的感情；而为了正确地享受后者，我们就必须有一种优美的感情。”（《论优美感与崇高感》，第3页）这说明，生活中的苦难与不幸能否转化为审美经验，在于我们能否对生活保持一种超越的审美心态。

六、休闲：观众与演员

从休闲的角度看，我们每个人既是生活的观众，又是生活中的演员。充当生活中的演员的时候，我们忘情地演戏与表演；这给我们带来极大的满足，这时候，我们是在尽情尽兴地玩一场游戏。但是，游戏有时也能观赏。对游戏的观赏，其兴味一点也不亚于玩游戏本身。这就是我们都喜欢看足球比赛、看歌舞表演，甚至看生活当中的众生相的道理。

当生活中的观众与当生活中的演员，其需要的素质与禀赋并不相同。有人天生是生活中的演员，这不是说他善于和喜欢表演，而是说他对表演异常地投入；当他表演时，完全忘记了“自我”的存在，他完全沉醉于艺术表演之中，在艺术的表演中获得高峰体验与情感的满足，其中当然也包含角色在遭遇不幸时的痛苦体验。这种生活中的演员，他需要的是尼采所说的“酒神精神”：在希腊酒神祭典的时候，酒神的信徒结队游荡，纵情狂欢，完全沉迷于眼前的一切，以至使眼前的现象发生了改变，在想像中看到自己是再造的自然精灵。反过来，充当生活中的观众，需要的是“日神精神”：日神充满理智的光辉，他能看透人间众生相，而且运用理智来加以解释，然后伴之以审美的欣赏。酒神精神也罢，日神精神也罢，都是一种身心的极度投入与忘我。只不过前者的忘我是情感的投入，而后的忘我是沉思与鉴赏。其本质都是休闲——情感的或者理智的自由。



但是，在生活中，我们恰恰更多看到的是休闲的反面：有人喜欢与满足于生活的表演，这种表演是表演给观众看的，因此，他喜欢和希望观众愈多愈好，甚至观众愈多，他表演起来就愈卖力。也有人喜欢看舞台演出和时装表演，但却是为了去凑热闹，或者附庸风雅。这其实是休闲的反面。作为休闲的人生艺术，无论是演出也罢，观看也罢，它只是一种自我体验与个人沉醉，它是“为己”而非“为人”的。

七、休闲与道德

有人说，休闲与人类道德是相冲突的，它甚至会成为社会道德的瓦解剂。其实，这是对休闲本性的极大误解。这里且不说社会道德规则的制定原是为了使人们在群体生活中可以活得更美好，这与休闲的目的是要使人获得幸福，从本性上说，是相通的。而从现实操作的层面看，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道德要成为可能，它是必须从人类的休闲本性出发的。就是说，社会道德要真正地能够遵守与贯彻，必须从人类的休闲本性中找到它的动力。

这就是为什么社会道德在产生之时总与原始的礼仪和宗教仪式联系在一起。休闲的要素包含着节日与庆典。这节日与庆典既可以是外部形式方面的，也可以是内在于精神的。就内在精神方面的要素说，“当且只有当我们心怀感赞之时，休闲感才会出现。”（戈比语）就外在的形式方面说，人们到教堂去做祈祷，可以获得一种普遍的同一感与归属感，心灵会获得净化，有一种精神上的被提升之感。而这正是社会性休闲与宗教的同源之处。因此，无论是社会性道德或者宗教性道德的建立，其心理前提都必须借助于休闲。

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很可以解释：为什么基督教节日会有那么多，并且安排星期日或者安息日。从起源上说，星期日既是遵守基督教惯例休息的一天，其中所有的工作被禁止，但它又是敬奉上帝、接受心灵净化的日子——休闲、宗教与道德就通过星期日这样巧妙的安排而取得了一致。

八、休闲与当代人类社会

理想的全民休闲社会的实现，需要它的社会物质条件。但是，当社会财富已极大地增加，人们已普遍地不需要为基本的物质生活或者温